

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文明

袁 广 阔

摘 要：近年来，河南偃师二里头、伊川南寨等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字形上可与商代金文相互对照。同时，二里头文化发现了成套的陶礼器和青铜礼器，表明该时期正是早期中国礼制趋于完备的阶段。晚商金文中一些器物类象形文字，在构型上与同时代器物存在明显的形态差异，反而与年代较早的二里头文化器物风格接近，字体创制时间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批早期文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独立孕育的产物，其发现与解读，见证了华夏文化礼器与文字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文明核心的礼制文脉传承。

关键词：二里头文化 符号 文字 礼器

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089）。

前 言

二里头文化是中原地区第一支强大而又空前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它改变了之前该区域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并存的格局。其分布中心在河南省中、西部的洛阳、郑州一带；辐射范围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到达开封地区，北部抵达晋南垣曲盆地一带。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下游，遗址面积约3平方公里，内有宫城、宫殿、居民区、铸铜作坊等遗迹，最近发现的井字形道路系统表明，这是一座规划有序的大型都邑。二里头文化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周边有聚落和方国城邑围绕，形成周边拱卫中央的格局。二里头文化因其存在时间和分布范围与《史记》《国语》等文献记述的夏朝晚期的年代与活动区域相符，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①

长期以来，文字的存在与否一直是学界探讨早期文明的重要观察点。目前早商文字的发现和研究有了新进展，从郑州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和小双桥的朱书陶文都可以证明此时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如郑州二里冈遗址出土一段牛肋骨，上

① 参见王震中：《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刻有 3 行 10 字。^① 郑州小双桥的祭祀坑中发现一些小型陶缸的表面或内壁有朱书文字，其文字内容可分为数目字、徽记类和祭祀短语类，^② 其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商前期的文字展示出中国文字至此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已是相对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正如黄德宽所说，小双桥遗址的文字展示出“写者已相当纯熟地掌握了书写技巧，表明当时文字发展和书写的整体水平较高，早已脱离原始状态”。^③

早商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为寻找更早的文字打下了基础，二里头文化考古新发现也为文字的研究引入了源头活水。近年来，随着一批二里头文化相关报告的集中刊布，^④ 人们发现这些二里头文化遗址均出土了一定数量且具有象形文字特征的符号。这些符号虽然往往单独出现，缺乏特定的文段语境，但字形多数已完全具备象形文字的特征，可与后期的甲骨文、金文相互对照。这些发现，对研究二里头文化晚期已使用的符号与文字的关系十分重要。

在早期文字的研究方法上，学界通常遵循上下沿承的研究理路。考虑到早期文字遗存相对缺乏，考古学界摸索出以殷墟文字为基础，利用象形文字追溯早期文字起源的方法论构想。“象形”是中国早期文字最主要的造字方法，苏秉琦曾说：“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人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⑤ 近年刘一曼又提出可以利用考古遗迹、遗物来印证商代文字的设想，并指出甲骨文字中可与考古材料对读者不乏其例，考古学与甲骨学相结合的研究对甲骨文字释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⑥ 曹定云、^⑦ 杜金鹏、^⑧ 王晖^⑨也从金文、甲骨文构形入手，运用考古类型学

① 参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郑州二里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 38 页。

②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小双桥——1990—2000 年考古发掘报告》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710—712 页。

③ 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2006 年第 1 期。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 1999—2006》（壹至伍），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伊川考古报告》，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师姑：2002—200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年；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编著，韩国河、张继华主编：《登封南洼——2004—2006 年田野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 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⑤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89 页。

⑥ 参见刘一曼：《殷墟车子遗迹及甲骨金文中的车字》，《中原文物》2000 年第 2 期。

⑦ 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 年第 12 期。

⑧ 参见杜金鹏：《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刻画符号与文字问题》，《中国书法》2001 年第 2 期。

⑨ 参见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

的对比法，在比较二里头出土青铜器与晚商铭文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时期已形成完备的礼制，能够制造成套的礼器。这一阶段礼制仪轨的渐趋完备和文字系统的互文出现，应不是偶然，而是恰恰提供了二里头与商代文字的使用与礼制活动、礼器系统的关联性的线索。^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目前寻找早期文字的研究理路，有两个可行的切入点：一是二里头文化考古遗存所见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字的比较；二是晚商器物类象形文字与二里头时期青铜器、玉器以及陶礼器等器物的形态学比较。

一、二里头文化考古发现的符号

二里头文化的符号多刻画于陶器表面，2000 年以前学界已确认出二里头文化字符 64 个，2014 年《二里头》新报告又公布了 40 个字符。李维明对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字符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符号基本字形不少于 50 种，约占所公布二里头文化陶字符基本字形总数的 78%。^②这些符号大体可分作数字类、文字类、图画类、印章类等。二里头文化的数字符号发现较多，符号位于大口尊口沿内壁，内容多为一、二、三、五、十，数字符号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下文主要讨论文字类符号。

（一）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类符号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文字类符号又可细分为象形类、会意类、合文类和印章类。

1. 象形类

目前象形符号共发现 50 多例，依内容可分为七类。

（1）自然类。如山形，二里头遗址 IIVT104：③31 作“”。^③形状为三个连续相连的山丘。

（2）遗迹类。如城形，二里头遗址作“”。^④这一象形符号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多处城遗址形状相符，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宫城。该符号明显作城邑之形，四边

① 参见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 年第 1 期；李春华：《从二里头遗址的主要发现看夏代礼器的几个特点》，《文物春秋》2006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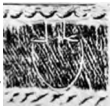
② 参见李维明：《二里头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考古与文物》2012 年第 6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第 304 页。

④ 杜金鹏：《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刻画符号与文字问题》，《中国书法》2001 年第 2 期。

城墙上还有城门示意。如井形，二里头遗址 IVH199: 3 作“”。^① 曹定云认为它是“井”的象形字。^② 井在龙山时期就被普遍使用，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水井用木棍砌出井形，与该符号的特征一致。^③ 如庐形，二里头遗址 VIHT13^④: 20 作“”形。蔡哲茂认为它是“庐”字的初文，与“六”同字，“六”为借字。^④ 王晖亦持此说。^⑤ 二里头文化中不少浅半地穴式房子，均与此字形相似。但曹定云认为应释为“皿”。^⑥

(3) 工具类。如镞形，二里头遗址 VH52: 4 作“”，为一矢的象形，也有作“”。^⑦ 二里头文化发现大量的骨、石、蚌以及青铜镞，其形状多为三角形，与陶器上的镞形符号特征一致。如车形，洛阳皂角树遗址陶盆 F4: 8 上的刻符作“”。^⑧ 两侧的圆较规整，中贯横轴，制如一轴二轮，顶部还有一扁椭圆形制

表示车厢。如尊形，二里头遗址 2005VT114^④: 1 作，图案位于大口尊类器物的肩部，小口长颈、平肩，平底近圆，从剖面的角度表现二里头文化早期小口尊

的形态，^⑨ 线图形状如图“”。如平底盆，二里头遗址 IVH73: 12 图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203 页。
- ② 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 年第 12 期。
- ③ 参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中原文物》1977 年第 1 期。
- ④ 参见蔡哲茂：《说金文“陆”、“睦”二字——兼论六、八、六、夫为一字》，《“故宫”学术季刊》（台北）1988 年第 1 期。
- ⑤ 参见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第 80—81 页。
- ⑥ 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 年第 12 期。
- 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 年第 5 期。
- ⑧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 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第 74 页。
- ⑨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 1999—2006》（贰），第 515 页。

案为二里头文化平底盆“”。① 大口、斜壁、浅腹，平底，从剖面的角度表现平

底盆的形态。如罐形，登封南洼遗址陶器上的罐 2004H224：5 。大口，鼓腹，圜底。从剖面的角度表现的是二里头文化最常见的大口深腹罐。如龙形，



，二里头遗址出土一块陶片（采：26），上刻有铜牌饰的“龙”的形象。② 二里头遗址“龙纹”铜牌饰，分作圆角近似方形和圆角方形：两侧各有两个带孔的纽，龙形的绿松石小片镶嵌成兽面纹样，圆眼圆睛。该陶片“龙”形作为图案，简化突出首部、眼部特征，臣字目吻部两侧有似龙须的弯曲弧线。



（4）人体局部类。如目形，（二里头遗址 IVT22：⑥11），为竖直、对称双目。报告人称为眼纹。③ 如手形，在郑州大师姑遗址二里头文化陶片（H39：17）上的手形绘符，虽然稍有残缺，但可以看出是个手形，而且是个线条造型类符号。④

（5）动物类。如鱼形，伊川南寨遗址发现了多例鱼形符号，如陶器（T86②）上的多条鱼形“”。⑤ 如鱼鳔形，伊川南寨遗址陶器

（T28H118）上的符号“”形，似一只葫芦，与鱼肚子里那个控制俯冲和上浮的气囊——鱼鳔形象一致。⑥ 如蝉形，登封王城岗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内发现一件陶簋，耳部外侧堆塑蝉纹。如龟形，二里头遗址（2000HIT2⑤A：25），为一龟。⑦ 如鸟形（2002VT29 剖 D6 夯：3）。⑧

（6）植物类。如禾形，二里头遗址陶器（采：28）上的陶符，作“”。从形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203 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302 页。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48 页。

④ 参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师姑：2002—2003》，第 109 页。

⑤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伊川考古报告》，第 75 页。

⑥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伊川考古报告》，第 75 页。

⑦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 1999—2006》（壹），第 176 页。

⑧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 1999—2006》（贰），第 510 页。

态特征来看,明显是禾苗之态。^①王晖认为是“叶”的初文。^②

(7) 其他类。如族徽类,但具体意涵不明。“”偃师二里头遗址(VIIIT14)^④

B: 13) 符号为三角形。^③



(2003VT34 ④: 13) 符号似舟形。



(2005VT102③: 1) 符号半弧状似“虹”。



(2003VH215: 4) 符

号位于细砂酱釉原始瓷盃的颈部,“私”形。^④这些符号刻画清晰,位置十分醒目。

2. 会意类

(1) “箛”。二里头陶符号作“”形(VIIIH72: 32),曹定云认为它是由“”和“”构成的,即“井”和“矢”,均与捕获动物有关。这个组合符号如释作陶文,应当是个会意字,为箭盛放入箭袋之义。古代箭袋以竹木或兽皮为之,即后来汉字中的“箛”。《玉篇》:“箛,矢器也。”商代后期金文中也有相似字形,一



支箭的如



、两支箭的如



、三支箭的如

(2) “丰”。二里头遗址陶符“”(IVT8③: 7),曹定云、王晖都认为应释为“丰”字,并指出“丰”字的本义原指树木或树枝,后来引申为分封,成为“封”的初文。所以二里头陶符应该就是古“封”字。^⑤

(3) “道”。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符“”,曹定云认为是从“”从“”的字,所从的“”是甲骨文中的“大”字,即正面站立的人形;“”像道路,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04页。

② 参见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第81页。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03页。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 1999—2006》(贰),第510、539、1054页。

⑤ 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年第12期。

所以，“𠂔”表示人在路中，是会意字。甲骨文中“𠂔”字（《合集》4910），^①从侧身站立的人形“人”和道路之形“𠂔”，是古“道”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个符号可能是甲骨文“𠂔”的初文，是更古的“道”字。^②

（4）“射”。二里头 （IIVT103 采：19），陶片上刻画为在弦上的箭，箭头为三角形，弦为一斜线。^③

（5）“钓”。（2004VH312：4），^④符号位于大口尊颈肩部，刻画出鱼钩和鱼的头部，身体残缺。复原后应为  形。

3. 合文类

（1）“”。二里头遗址陶器符号中，一件大口尊肩部烧前刻出“目”形，^⑤而在使用过程中又在“目”的前面加两个“L”形符号，组成三个字符，即 。

（2）“”。二里头矮领尊（2002VH73：5）肩部残片上保存有两个字符，其中一个为铲形。^⑥

（3）“”。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出土的一件二里头文化陶觚上刻画出“、”二字形，“”下部类似月牙形，月牙形的上面有一块用闭合曲线构成的不

①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第 1—1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2 年。简称《合集》。

② 参见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 年第 12 期。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203 页。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 1999—2006》（壹），第 355 页。

⑤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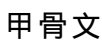
⑥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 1999—2006》（贰），第 851 页。

规则的形体。^①

4. 印章类

渑池郑窑遗址出土的陶戳属泥质红褐陶，火候较高，方柱形，长 5.5 厘米、宽 2.3 厘米、高 20 厘米，三面有刻画符号，其正面的戳记刻画结构清晰，其中一面符号相当于甲骨文中的“田”字。在该戳的两端各有一圆窝，圆窝的周围亦有刻画的圆弧线或直线。此戳形器当具有印章的性质。^②

(二) 二里头文化象形类字符与商代文字的承续关系

1. “”与“山”。二里头遗址的象形符号“”，在郑州商城遗址第八区商代宫殿区出土的陶符上作“”形，甲骨文中作“”形，展现出极为相似的字形与一脉相承的造字理念。

2. “”与“墉”。二里头遗址的象形符号“”，甲骨文中与之最相近的象形文字为“”，^③均作四方城郭、每边开城门之状，仅城门样态略有差异：二里头刻符是平头突出；甲骨文是屋顶尖形突出，类似建筑物的顶部。学者将“”释为“墉”字。

3. “”与“车”。二里头皂角树遗址象形符号“”，与殷墟出土陶符中的象形文字“”^④十分接近；只是皂角树的“”顶部多出扁椭圆，似伞盖；而殷墟陶符“”展现出更多的细节刻画，多释为“车”字。

4. “”与“目”。二里头遗址的 (IVT22⑥：11)，为竖直的对称双目；郑州商城杨庄出土爵的腹部一侧也发了相似的对称双目形符号。曹淑琴认为是商周金文中常见的“”字。^⑤

5. “龟”。二里头遗址的刻符“”，与郑州商城大口尊（C8T11③）：

① 参见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② 参见张居中、王良启：《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③ 参见岛邦男：《殷墟卜 综类》，东京：汲古书院，1977年，第266页。

④ 参见李济：《殷墟陶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3页。

⑤ 参见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

152) 、^① 商城白家庄墓葬出土青铜尊颈部三个等距离的龟形图像都接近。唐兰释为“𪚩”，也有人认为是龟徽，应为族徽文字。^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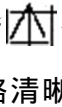
6. “鸟”。二里头遗址的鸟形符号  (2002VT29 剖 D6 夯: 3), 在郑

州商城大口尊 (ZFH1: 45) 口沿内侧也能找到相似字形 。^③

7. “射”。二里头遗址的 ，陶片上刻画为在弦上的箭。郑州商城大口尊 (97ZSC8IIT158^⑤) 口沿内也是如此；而在殷墟器物上的“射”则为弓箭完整形象  (射妇桑鼎 1378)。

8. “尊”。二里头大口尊肩部刻画的  (2005VT114^④: 1), 直口、广肩, 底部近圆, 与金文中的尊的形体特征接近, 都是小口、圆底, 二者承袭关系明显:

 (2005VT114^④: 1) →  (亚西罍 9160) →  (西己鼎 E188)。

9. “箛”。二里头陶符中有作“”形者 (VIIIH72: 32), 应为金文中的“箛”字。这一字形变化由夏历商脉络清晰: 二里头的只有箭头和箭匣 ，殷代早期只是多了箭杆  (箛贝卣 4882)、殷代晚期变成三个箭杆  (箛戊册父辛卣 5169)。

10. “钓”。甲骨文也是手持鱼钩钓鱼的形象, 二里头遗址的图像虽然残缺, 但构图中钓鱼表现手法  与甲骨文  (《殷虚书契前编》5. 45. 4) 一致。^④

① 参见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② 参见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

③ 参见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第109页。

④ 参见罗振玉、罗福颐类次:《殷虚书契(五种)》,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71页。

这些生动的字符比较实例，充分展示出部分二里头文化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字间极强的相似性。这一相似现象的普遍性，表明二里头文化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字间存在有序且稳定的传承关系。换言之，商代的很多象形文字的字源，很可能来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二者一脉相承，展现出文字系统的连贯性。

（三）二里头文化象形类字符的思考

1. 象形类字符与人群标志

二里头文化族徽的来源有二：一是与手工业生产作坊有关的工匠族徽，二是与氏族标志有关的族徽。

（1）工匠族徽。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尊、罐、斝、觚等字符均与手工业作坊族徽有关。登封南洼遗址陶器上的罐（2004H224：5）可能与制作陶器或陶罐有关。该遗址的发掘区正是手工业生产地，共清理出9座陶窑。发掘者认为“应是一个白陶专业化制作中心”。^① 斝、璋、觚等符号的发现与手工业人群的关系，也可在晚商和西周族徽中得到验证。

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孝民屯铸铜作坊、大司空制骨作坊等区域内发现有墓群，随葬品证明死者多与手工业生产相关。如刘家庄北地发现10座陶窑，^② 2011年又发现20座陶窑。^③ 由此可确认这是一处大型制陶作坊。陶拍2010AGDDIIF21：9，柄部一侧刻“𠂔”字。陶拍2010AGDDIIM77：01柄部刻“𠂔”字，应释为“羊”。陶拍2008AGDDIIF40：9，^④ 柄部刻“𠂔”及“𠂔”两字，这些都与商代晚期族徽有关。

周原遗址“齐家制石作坊的产品以石块为主，作坊与制玦遗存共存的遗迹单位中，出土包括‘璋’、‘爻’、‘璋爻’等三类族徽，其中璋即为石璋形象，与该作坊生产的石块均为典型玉石器中的一种。齐家北漆木器作坊中发现的陶文族徽‘觚’字，在卜辞、金文中是该器的复体象形字。由此可知齐家北漆木器作坊族徽也与作坊产品性质相同”。^⑤ 同时考古工作者发现周原的这批工匠是由殷墟迁过去的，“璋”“觚”等工匠族徽在殷墟也有发现，且徽标基本相同。二里头、安阳殷墟、周原等遗迹发现的这些工匠族徽，更证明二里头文化与商周的文字体系具有明显的沿承性，

① 韩国河等：《用中子活化分析研究南洼白陶的原料产地》，《中原文物》2007年第6期。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2期。

⑤ 郭士嘉、雷兴山、种建荣：《周原遗址西周“手工业园区”初探》，《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它们使用的符号文字属于同一体系。

(2) 氏族标志。与二里头氏族标志有关的族徽，有



等，

这类标志历史悠久。如江陵荆南寺陶甕 (T1④C: 42) 上的符号  与二里头小口尊 (81YLIHT22⑤: 2) 上的符号一致。陈昭容说: “对于史前陶器上的刻划记号, 宜放置于汉字演进的历史轨迹上来看……有一部分则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 向文字的路途演化, 和汉字的孕育发展有相同的步调, 因而不同时期的陶文中可看出汉字发展的痕迹。”^①

2. 二里头与安阳殷墟符号的比较

将大家公认的殷墟文字与二里头的符号比照, 对于认识二里头的符号是否为陶文具有一定的意义。第一, 我们发现二里头文化及商代前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小双桥乃至殷墟出土的数字和象形符号特征一致, 不论是在形体特征还是内容上都有传承, 属于同一系统, 不少符号与殷墟陶文一样, 如车、鱼、铍等。第二, 二里头文化和殷墟都多为单字 (符号), 一般一器一字 (符号), 多为族徽、人名。第三, 陶器并非当时书写文字的载体。正如李孝定指出: “小屯殷墟: 出土陶片近 25 万片, 有字陶片计 82 片, 其百分比为 0.0328%, 这种统计方法虽然很粗疏, 但可以确定一点: 即有字陶片所占的百分比都极低。”^②

二、二里头文化器物与商代后期铭文“器物字”

据统计, 目前殷墟二期至四期的有铭青铜器共 5730 余件, 其中单字铭文的青铜器接近 2000 件, 2—4 字铭文的青铜器约为 3300 件。^③ 殷墟青铜器铭文在书体特征、铸造部位及意涵功能方面与商代前期基本相类, 但族徽类文字数量更丰富、内容更多样。

晚商族徽文字中“器物字”作为象形字, 字形多取自早期的器物形象, 尤其是礼器造型, 简洁、古雅、写实, 展现出先民在文字初创阶段对现实器物直观的造字

① 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57 本第 4 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 年,第 669—762 页。

② 李孝定:《小屯陶文考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 年,第 305—335 页。

③ 参见毕秀洁:《商代铜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1 年,第 1 页。

理念。参考考古类型学及年代分期,我们发现晚商器物字中爵、牙璋、钺、鬲、甗、尊、爵、豆、觚、盃、鼓形壶等字在字形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器物特征,早于其所属青铜器的年代。下文将撷要对晚商铜器上的“器物字”铭文形象与二里头时期至晚商时期的器物进行对比,以出土文物器形为主要依据,探讨这些“器物字”的创造时间。

(一) “爵”

二里头文化铜爵制作规整,器壁厚薄均匀,形体瘦高,流尾间距较长,窄长流尖尾,束腰平底或呈椭圆形底,下腹突出,下接三足,足外撇,如 VKM8: 1、YLHIM2: 2。^① 早商铜爵器身变宽,平底,流口增高,尾变圆,流有二柱。晚商铜爵卵形腹,圆底,柱加长并后移。殷墟金文中的“爵”字(《集成》10. 4988)^② 为长流尖尾、形体较高、无柱,与二里头时期的铜爵特征一致。(图 1, 第 2、7)

	爵		鬲	融	尊	
二 里 头 文 化						
	1 (LIVT151M4)	2 (VKM8:1)	3 (YLIXH11)		4 (YLIX11)	5 (YLVIH6)
商 青 铜 铭 文						
	6 (8840)	7 (10. 4988)	8 (9616)	9 (J375)	10 (10880)	11 (5492)

图 1 二里头出土器物与商代“器物字”比较

二里头文化早期陶爵流尾较长,无柱,深腹,实足纤细。例如,二里头遗址的 LIVT151M4、伊川南寨 T82M3: 4 爵口部有冲天流,近流处无短柱,流口间附小圆饼,深腹,平底,无尾,圆锥状足外撇。^③ 早商时期陶爵口部开始出现柱,尾部变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252 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文中《集成》均出自该著。

③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伊川考古报告》,第 94 页。

短。(图 1, 第 1、6) 殷墟金文(新收 1301、《集成》14. 8840)“爵”字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伊川南寨陶爵特征一致。(图 4, 第 3、8) 但甲骨文中爵字都表现出了高柱、长流的特征, 显然殷墟甲骨文中的“爵”字是取象于商代的青铜爵, 其来源要比金文“爵”字晚一些。

(二) “璋”

二里头文化发现较多牙璋, 其形体较大、器身较平直, 下部有较长的扉齿, 首部较宽并下凹, 锋呈牙状, 较为尖锐, 无使用痕迹。此类器物在二里头时期较为盛行, 并作为礼器常出土于大型墓葬中, 如玉璋 YLVM3: 4, 出土时器体涂满朱砂,^① 但至商代早期二里冈文化的墓葬中同类形制的牙璋已经不见出土, 殷墟时期也已完全不见踪迹。但殷墟铁三路 M89 青铜器觚的圈足内铭文“璋”字^②与《集成》14. 8707 铭文“璋”字皆为歧首弧刃、扉齿较长。殷墟铁三路 M89 觚上铭文“璋”字形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牙璋一致, 但再向后延伸如《集成》上的铭文文字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图 2, 第 1、3、5), 但其粗短形状有铸钟形, 扉牙出现在器身而非器柄。学者多认为该字仍为“璋”。^③ 甲骨文的“璋”只有形而无扉齿了, 因此, 杨州推测“甲骨文的章(璋)形的最初象形字是《花东》29. 4、149. 2 中的(璋)形”,^④ 实际上是《集成》14. 8707 铭文“璋”字省去扉牙的再简化。(图 2, 第 1、3、5)

(三) “戚”

二里头的玉戚刃部为平弧形, 刃角上翘, 在内部有两条凸弦纹, 在两弦纹之间的凹槽中有两个成中心对称的圆穿孔, 两侧有对称的扉棱。^⑤ 《集成》16. 10532 铭文“戚”的器身较为瘦长, 刃部略弧并大于器体, 刃角上翘, 扉棱夸张, 突出分三牙, 中部有一较大圆穿孔, 形制规整, 与二里头的同类器在形体、弧刃等主要特征上相一致。(图 2, 第 2、4) 该类戚在殷墟也有发现, 因延续时间可以至商代晚期, 目前也不能排除为晚期所造的可能性。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3 期。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铁三路 89 号墓的发掘》,《考古》2017 年第 3 期。

③ 参见何毓灵:《试析殷墟一座玉匠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26 页。

④ 杨州:《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章(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⑤ 参见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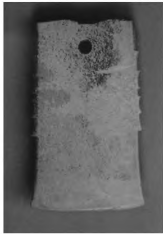
	璋	戚
二 里 头 文 化	 1 (YLV3:4)	 2 (75VIIKM:2)
商 青 铜 铭 文	 3 (铁三路M89)	 4 (10532)
	 5 (8707)	

图 2 二里头出土玉器与商代“器物字”比较

(四) “鬲”

鬲是商文化的常用炊器，先商至晚商长盛不衰，更成为青铜时代的固定礼器组合。其在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即已出现；从形态来看，二里头文化三、四期(YLIXH1)与先商文化阶段陶鬲流行长颈高领、高袋足、细绳纹等特征，如鹤壁刘庄的鬲(M94:1;图3,夏)。^① 早商时期陶鬲主要表现为卷沿矮领、高袋足，如二里冈鬲(C9T124^②:98;图3,早商);^② 晚商为折沿无领、矮裆近平等，如安阳大司空鬲(T0707H349:7;图3,晚商)。^③

殷墟金文中鬲仍然保留早期的高领特征。(9616;图1,第3、8)殷墟金文中

① 参见河南省文物局编著：《鹤壁刘庄——下七垣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②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627页。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鬲”与从鬲的“融”字，在字形上的典型特征都是长颈高领、高袋足，形态与二里头文化或先商时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鬲”字这一高领高足的形体特征在商周文字中一直保留下来，直到小篆中高领部分才简化为“口”，并沿用至今。（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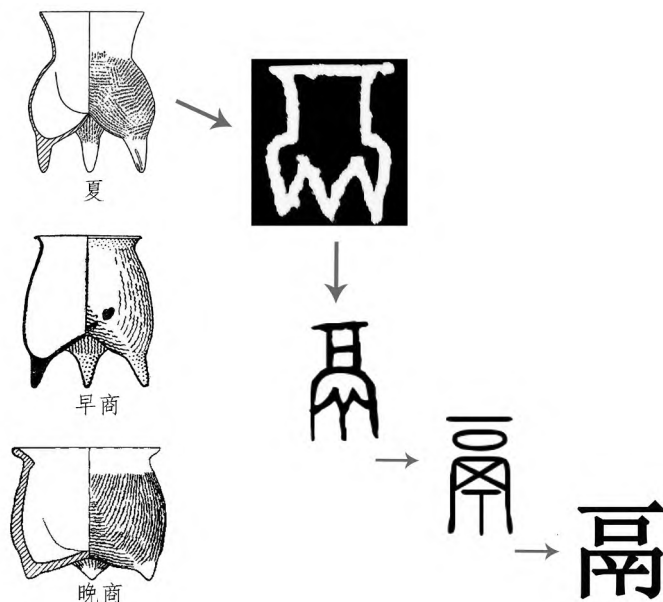


图 3 夏商陶鬲与“鬲”字演化

（五）“甗”

甗是商文化的主要炊具，先商时期开始大量发现，二里头文化陶甗数量不多。先商阶段与二里头文化三期，陶甗的甗部为敞口深腹，或有平沿，束腰，鬲部分裆，袋足瘦长，实足跟较高，如安阳郭邓遗址的甗（H32：46）；早商时期则转为卷沿，矮裆，袋足变肥；晚商时期特征为折沿、矮裆近平，三实足较矮。《集成》13.8283 金文“甗”字中的器物形态，宽平沿敞口，瘦腹呈桶状，束腰，袋足较瘦，实足尖较高，与安阳郭邓遗址出土的先商时期同类器物一致（图 4，第 1、6），^① 说明金文“甗”字的时代较早。而甲骨文中也有大量“甗”字，如《合集》629 宾组，其特征是有立耳、深腹、袋足，形体特征与商代早期青铜甗一致，显然殷墟甲骨文中的“甗”字是取象于商代早期有耳的青铜甗，其造字的时代要比金文“甗”字晚一些。

（六）“尊”

大口尊起源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兴盛于商代早中期，消亡于殷墟时期。就器物

^①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郭邓》，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年，第 209 页。

特征而言，二里头文化时期口径小于肩径，直腹，小平底或带圈足；早商时期大口尊，口部较大，逐渐大于肩径，圆肩，直腹；晚商时期口为喇叭形，无肩，形体变长。此外，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高领小口尊也较为典型。^① 二里头和早商阶段陶器符号多刻画在大口尊的口沿上。

晚商金文中的“尊”亦分大口、小口两类，《集成》7591 铭文中的“大口尊”呈“酉”形体，大口，高领，鼓肩，小平底；《集成》10880 铭文中的“小口尊”高领小口，形制特征分别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口尊、小口尊一致；（图 1，第 4、5、10、11）这也与文字学家认为“尊”字初文如长颈盛酒器形的观点相合。也有学者提出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从“酉”的字，如奠、酒、尊等，字形上都与二里头时期大口尊形细节接近。^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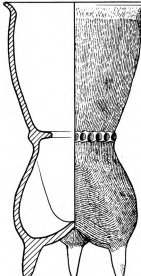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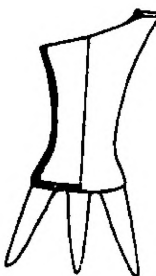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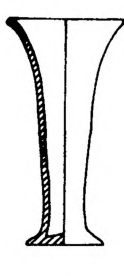
	甗	爵	盃	觚
二 里 头 文 化	 1 (H32:46)	 2 (M3:4)	 3 (M3:6)	 4 (M33:2)
商 青 铜 铭 文	 5 (13. 8283)	 6 (1301)	 7 (3039)	 8 (13. 7723)

图 4 二里头出土器物与商代“器物字”比较

(七) “盃”

陶盃是二里头文化典型的酒器，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盛行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至商代以后基本不见，其形制主要表现为弧形顶，短流，直腹，三袋足，一

① 参见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3 年，第 69 页。
② 参见杜金鹏：《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刻画符号与文字问题》，《中国书法》2001 年第 2 期。

侧有较宽的鋈。^① 二里头文化早、晚期整体形态从瘦高向矮胖发展。晚商金文中的“盃”字的形象即为陶盃的侧面之形，器身中部有一方形小框，从与金文中的盾牌和甲骨文中“爵”的比较可知，该方框为器物的扳手，其形体的瘦长袋足和圆形冲天管状流的特征十分接近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同类器的形制。（图 4，第 4、9）

（八）“觚”

二里头文化陶觚一般为桶形，形体瘦高，口较大，口以下弧形内收，直腹，底沿外突，如南寨 T93M33：2 陶觚为喇叭口，平底，深筒腹，束腰。^② 晚商铭文《集成》13.7723“觚”的形态与二里头文化陶觚特征一致。（图 4，第 5、10）

（九）“鼓形壶”

鼓形壶为模仿木鼓形状而制作的容器。二里头 VIH9：7，细颈圆口，扁圆体，边缘有三周象征鼓钉的小泥饼，下有二足；^③ 驻马店杨庄遗址出土的同类器为圆口细颈，扁腹，圈足，腹面边缘饰三周联珠纹象征鼓钉，中央饰斜方格纹象征鼓面的皮革。^④ 晚商金文中的“鼓”字与杨庄遗址发现的鼓形壶特征最为接近。

（十）“豆”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豆数量较多，分深浅盘、高矮柄等形制。早期深盘较多，盘壁较直，晚期沿较宽，豆盘上鼓下平。晚商铭文中的“豆”（《集成》10.5395.2）与二里头时期喇叭状高柄豆形体特征接近。（图 4，第 2、7）

比较晚商金文中的部分“器物字”与二里头时期的对应器类，可以发现四类情形：其一，晚商器物字中的“爵”“璋”“鬲”“觚”“尊”等字的构型体现出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的器形特征，字形与二里头文化的器物高度契合；晚商器物字中的“盃”“觚”“壶”等字在字形上有变异，这部分字有的可能不是其原始形态，因此字形既表现出二里头器物特征但又同殷墟同类青铜器近似。商代后期铭文中有不少的建筑类、动物类铭文也不排除属于此类；其二，二里头等遗址出土少量的器物字如“尊”（“酉”）“盆”多采用剖视手法体现与殷墟金文“尊”“皿”等字剖视的特征一致；其三，“鬲”“觚”器物字的造型多与先商文化典型器一致；其四，金文所示器物曾流行于二里头文化与先商文化。这些金文物器字展现出来的器形细节，与其依附的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 年—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134 页。

②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伊川考古报告》，第 87 页。

③ 参见袁广阔：《二里头文化研究》，第 74 页。

④ 参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1 页。

铜器年代特征明显不同；它们作为文字虽然广泛使用于晚商时期，但字形特征却取象于年代更早的二里头文化或先商文化时期。

器物字在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使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还与这些文字的使用功能相关。象形字的创制过程，就是先民对于现实事物的摹绘、提炼与记录过程，而其中族徽文字承载的部族观念和群体认同，礼器类“器物字”承载的国家权力与秩序，字形上展现出明显的承续感，这也为晚商部分甲骨、金文的创制年代或可早至二里头时期提供了重要佐证。由此，借由商代“器物字”与二里头时期考古文物的比较研究，我们或可弥补夏代文字实例阙如的缺憾。

三、二里头礼制文明与器物字的关系

学界一般将文字与铜器、城市、礼仪祭祀中心一并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而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一环，文字与礼制这两大要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尤为突出，且彼此连契，密不可分。本文以器物字为切入点，尝试观察文字与二里头文化礼制文明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考古学资料中梳理二里头文化与商周书同源、礼同轨的文化连贯性与沿承性，勾勒中国早期礼制文明格制渐具的发展脉络。

（一）器物字与礼器组合

前文通过观察商代铜器上的“器物字”，我们发现商周时期作为权力与秩序象征的礼乐祭器组合，实际上在二里头时期已渐具规制；这些“器物字”所代表的鼎觚爵豆尊等礼器类型，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已有集中出土，包括陶礼器、青铜器、漆器和玉器等。而最核心的青铜礼器只在具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出现，如二里头遗址墓葬中的铜爵、盃等酒礼器，在其他大中型遗址均不见。以爵、盃为代表的铜器群的出现反映了酒礼在二里头文化统治阶层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文化现象，均可从二里头和商代“器物字”符号中找到线索。

以裸礼为例。裸礼是先秦时期的重要礼仪，一般是指以降神为目的的祭祀形式。《诗经·文王》正义：“裸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①《尚书·洛诰》孔颖达疏：“裸者，灌也。”^②可见裸礼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施行于宗庙祭祀及宾客飨燕诸礼之中。《礼记·祭统》：“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在已出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中，晚商和西周裸礼的记载都十分丰富。那么，用于裸礼的代表性礼器又是什么呢？

①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16《文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5页。

② 王肃、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15《洛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7页。

《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斚，周以黄目。”郑玄注：“夷读为彝。”^① 邹衡认为：“鸡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盃，也是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鬲。”^② 而从考古资料观察，裸礼和“鸡彝”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漆觚就与裸礼相关。考古研究表明，裸礼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严志斌发现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圆陶片应该是漆觚底部塞孔用的，其功能应与良渚文化漆觚底部出现的木塞或圆玉片相同。良渚文化的漆觚使用制度，很可能就是二里头文化漆觚器用制度的来源。可见裸礼的来源相当古老，良渚文化时期就在江南地区流行。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进入中原后，裸礼一直被接受、应用并随早商文化的开拓而广布，传承至西周时期。洛阳—郑州一带是裸礼的核心使用地域，《集成》05444 所录殷墟四期的铜尊铭文，有作人形，手持觚形器，觚形器中放置一物，或为觚中置瓚（玉柄形器榫于木棒之上）的商周裸礼场景。^③ 邹衡认为，觚、爵、盃、三足盘等是“夏文化中最主要的礼器，它们的存在，体现了夏朝的部分礼制”。^④ 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中，可以看出以陶爵、陶觚为核心的酒礼器组合初具雏形，二期以后增加了盃、杯、壶等。陶质酒礼器与青铜礼器相比而言其种类更齐全、形体特征更稳定，并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与继承性，因此学者多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爵、盃等是模仿陶礼器而来。

既然考古发现二里头墓葬中出土的漆觚、陶觚为裸礼器，那么与之一起成为组合的爵、盃、觚、鬲、尊、豆、平底盆等应都为当时的重要酒礼器。而且这些礼器类型，既是当时“器物字”的主要构成，也符合《说文》以酒灌地以祭祀祖先的酒礼器组合。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鼎、爵、觚、壶等被商人所接纳，在此基础上商文化又创制了青铜斚，开始使用觚、爵、斚组合，而舍去了二里头文化人群所重视的陶盃。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组合爵、盃、觚、鬲、尊、豆、平底盆等，在商代被鬲、爵、盆、豆取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器物字在夏商之际使用的连续性，恰恰反映了这些文字代表器形使用功能的稳定性。“器物字”的传续发展，见证了夏商礼器组合的规制沿承和国家礼乐秩序的有序发展。

考古发现证明，早期文字与制礼作法的巫师阶层关系密切。小双桥的文字主要出土于宫殿建筑附近祭祀坑内，^⑤ 说明器物上的文字与祭祀活动相关。

（二）礼制实践与以器造书

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二里头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礼”“乐”的实物体现，作

① 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 31《明堂位》，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490 页。

②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149 页。

③ 参见严志斌：《漆觚、圆陶片与柄形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 年第 1 期。

④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 165 页。

⑤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郑州小双桥遗址 2014 年 IVA02 区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9 年第 5 期。

为一种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礼制已经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在当时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而当时的礼制活动，多与巫觋或“伶官”这一特殊群体的礼仪实践相关；他们不仅是礼制活动的主持和管理者，也是早期器物字的造作和书写者。何弩认为：二里头文化宗庙祭祀时，多由“伶官手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跳舞时，它则是萬舞的道具”。^② 杜金鹏根据二里头遗址大型墓葬随葬的绿松石龙形器以及青铜龙牌饰等，推测二里头文化有一特殊身份群体主导宗庙管理和祭祖活动，“手持‘龙牌’列队行礼，或手持‘龙牌’边唱（颂扬祖先功德）边舞”。^③ 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当时应该存在一个一定规模的巫师集团。其中一些巫师开始结合礼仪需求，在不断使用 and 实践中，依照礼器的形状创制“器物字”。因此，青铜器中的“龙形”牌，玉器中的璋、戚，陶礼器中反复使用的爵、盃、尊、豆、壶等相关“器物字”率先出现。这些象形文字最初与祭祀、占卜关系密切。也可以说汉字是由分布于多区域的先民们在族徽、计数、祭祀等文明要素的基本需求下，不断地创造着、积累着，最终由夏代国家巫师集团汇集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形文字系统。

由是观之，二里头的器物字基本是按照礼器的客观形体，用线条勾画出器物的特征的造字方法。器物字多用正视角度表示，绘画水平极高，把器物的特征表现得十分准确，这应当是有着超高绘图技术的巫师完成的。这些早期器物字的特点是形象逼真、器物与读音一体，每个符号都有相对稳定的书写方式。对比新石器时代刻画在器物底部的符号，二里头文化的“器物字”同礼器组合与礼制活动密切结合，属于真正的文字体系。

结 论

考古研究表明甲骨文中的“册”，并非龟册，而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④ 二里头文化目前无大量文字发现，应当与文字载体有关。二里头文化发现的文字符号多在陶器上面，但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偶尔出现的单体文字多与“族徽”有关。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字的创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创新和改进，二里头的文字在商代延续使用，但商代早期、晚期都还在不断地创制出新的文字。

通过对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类符号进行分析，可以推测那些刻画在陶大

① 参见李晓明：《夏代礼文化态势考辨》，《当代法学》2003年第11期。

② 何弩：《二里头绿松石龙牌、铜牌与夏禹、萬舞的关系》，《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③ 杜金鹏：《中国龙，华夏魂——试论偃师二里头遗址“龙文物”》，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④ 参见袁广阔：《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光明日报》2021年5月12日，第11版。

口尊口沿内侧的数字符号多是用来做标记的,可能是举行祭礼时表示祭器陈列的位置次序等功用;那些刻画在陶器外侧的“尊”“罐”“斝”等象形符号当与二里头文化手工业生产作坊有关的工匠族徽或氏族标志有关。这些字符与商代象形文字的相似性极强。商代部分“族徽”象形文字,很可能来自二里头文化时期,二者一脉相承,展现出文字系统的连贯性。研究发现,刻画在陶器上的陶文和以礼器为代表的象形字的使用者不同。二里头文化陶器的符号多出土于作坊区,以及居址和废弃的灰坑中。这些日用陶器上的符号传递的信息多与作坊或者“族徽”有关。二者使用的场景地点不同,而礼器都出土于墓葬中,特别是青铜礼器都出土于大墓中,这与当时举行的裸礼关系密切。与礼制有关的象形字显然与制度、秩序有关。因此二里头文化文字的使用者当是具有沟通神灵资格的帝王与巫师。

通过考古发现的比较研究,可以梳理出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脉络。从文字创制之法来看,中国早期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商代后期大部分象形文字都经过不断简化与提升,成为突出部分特征的文字。但少量象形文字的图画特征仍可在早期青铜器、陶器、玉器形象中找到原型。考古证据表明,商代甲骨、金文中有一批象形文字取象于二里头时期的器物,这些文字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开始出现,并以类似于“活化石”的形式保留在商代文字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是礼制,中国文明起源走的是一条独立的礼制文明之路。中国早期文字与礼制、礼器关系密切。正如卜工所说:“古代中国的精神生活自成体系,别有洞天,别样精彩。那是礼制的天下,礼制的天堂。其发生的年代更早,礼仪活动更有秩序,礼制的观念和意识流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特色。……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魂魄之所系,根基之所在。”^① 汉字作为华夏文明的承载工具,对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世界唯一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成果,也是促成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绵延五千年而不断裂、独一无二的文明的主要原因。

要之,通过比较二里头文化器物造型与商代器物字的相似性、梳理象形文字的发展脉络,或可找到一条研析中国早期文字传承脉络的新思路,勾勒出早期文字一脉相承的演变轨迹。由此可以推断,二里头文化的文字在早商时期延续下来,并在殷墟时期得到了发展,从而形成公元前两千纪以来中原地区的文字传统。而华夏早期礼制文明的发展,也在夏商文字的传续发展中,见证着礼器组合的规制沿承和国家礼乐秩序的有序发展。

〔责任编辑:晁天义〕

^① 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从石峁说开去》,《光明日报》2017年1月10日,第12版。